

比较果戈里和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

◎ 杨瑾夫

(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,四川 成都 610207)

摘要:果戈里和鲁迅是不同时代的两位伟大作家,他们的同名小说《狂人日记》代表了各自的时代背景,呈现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批判。本文通过“狂人”形象的选择及比较,探索俄国作家果戈里和中国作家鲁迅同名小说《狂人日记》的渊源、两部小说各自的特点以及鲁迅小说的创造性,最后得出两部作品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原因。

关键词:鲁迅;果戈里;狂人;比较分析

中图分类号:I106.4-03

文献标识码:B

文章编号:1672-9404(2023)35-028-03

1834年,俄国现实主义作家果戈里创作了一部名为《狂人日记》的小说,通过一位被社会阶级压迫到精神崩溃的微不足道的小公务员的眼睛,展现了一个荒诞的世界,其中包含了狂人的视角、两只狗之间的对话和几篇令人困惑的日记。这部作品以其非凡的艺术构思和形式上的荒谬性,描绘了主人公如何在不断地羞辱和虐待下走向疯狂。相隔84年后,即1918年,中国文学巨匠鲁迅发表了与之同名的小说《狂人日记》,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。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塑造了一个深受“迫害狂”困扰的狂人形象,通过这位狂人的观察和经历,深刻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深层腐败。这两部作品虽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作者在不同时期创作,却都以独到的视角和创新的表达方式,深刻地批评和反思各自所处社会的弊病。

德国文学巨匠歌德曾经指出,艺术各门类之间存在渊源关系,强调了大师级人物能够吸纳前辈智慧精髓的重要性,这一过程恰恰铸就了他们的伟大。在文学领域,鲁迅与果戈里两位杰出的作家也体现了这一点,特别是他们创作的同名小说《狂人日记》之间的联系。本文首先探讨鲁迅对果戈里作品的阅读、翻译及评价,以此为起点,追溯果戈里对鲁迅塑造狂人形象的潜在影响;然后深入分析《狂人日记》这一特定作品,探讨两位作者为何将狂人设为主角并运用日记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,旨在理解日记体如何作为工具揭示人物心理变化和社会批判的功能;随后比较两位狂人在身份定位和心理特征方面的异同,揭示两部作品在表现手法和主题探讨上的差异与联系;最后讨论两种狂人形象之间的差异及其成因,展示鲁迅是如何在吸收果戈里精华的基础上,结合中国特有的社会背景,创作出具有独特文化价值和深远社会意义的现代文学作品。通过分析,文章旨在阐述文学作品如

何跨越文化与时代的界限创新性地传承和发展^[1]。

1918年5月,《新青年》杂志发表了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,其现代化的内容和形式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。这篇小说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,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,围绕这篇作品的研究文章已达到数百篇。比较分析《狂人日记》与国内外众多作品,激发了学界浓厚兴趣。尤其是与果戈里同名作品的对比,成为众多论者研究的焦点。随着多种文学批评理论的引入,关于这两篇作品的比较研究展现出多样化的趋势。

为了深入比较两个狂人形象,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广泛参考了众多国内外相关文献,按照几个主要类别整理和讨论相关研究资料,以便为读者提供清晰的研究框架和深入的分析视角。

在国际舞台上,鲁迅及其《狂人日记》与果戈里同名作品的比较研究成为中国文学(汉学)研究向现代范型转变的标志之一。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,他的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,不仅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,而且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。尤其是日本,对鲁迅的研究显示出显著的热情和深度。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贡献尤为突出。

竹内好,一位杰出的日本文学评论家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,对鲁迅的研究在战后影响深远,并持续被后来学者引用。他在著作《鲁迅》中提到,《狂人日记》的创意受到了果戈里同名作品的影响。这一点不仅肯定了两位作家作品之间的联系,而且突出了鲁迅在思想层面的创新,特别是对“吃人”的认识和罪的意识,反映了作品中新旧思想的冲突与转换,对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
另一位日本研究者新岛淳良,在其著作《读鲁迅》中,通过对比分析两部《狂人日记》,指出了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:果戈里的作品着重于主人公性格的发展,鲁迅则通

作者简介:杨瑾夫(1997—),男,四川成都人,硕士研究生在读,研究方向:俄语语言学。

过“狂人”这一形象,直接表达了作者的心声,未详细叙述狂人发狂的经过,使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成了“观念小说”,具有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。

相关分析不仅展示了日本学者对鲁迅和果戈里两部《狂人日记》的深入研究,而且体现了鲁迅作品在思想深度和艺术形式上的独特性。通过跨文化的比较研究,人们能更全面地理解两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,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重要地位^[2]。

果戈里与鲁迅这两篇同名小说之间的影响不容忽视,尤其是在将“狂人”这一独特形象置于小说主角的决定上。在文学的广阔历史空间中,不论是西方的悲剧还是东方的爱情诗,作家们在人物塑造上的选择都深受其时代背景、个人经历、思想理念和艺术修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。为了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,作者们经常倾向于选择具有特殊属性的人物,如性别、职业或年龄等。这些考虑因素共同作用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构建,赋予其丰富性和生动性。然而,两部作品中“狂人”的特殊性和独特性,并非仅仅由上述因素所决定,而是已经超越了常规世界的范畴。

在这一点上,两位作家的选择显得尤为深意——他们没有将主角塑造为一般意义上的特殊人物,而是选择了“狂人”这一形象。这样的选择反映了除一般的现实状况、个人经验、思想倾向和艺术修养等影响因素之外,有更深层的决定性因素。在这两部小说中,“狂人”的形象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性别、职业或年龄等特殊,而且是他们代表的精神状态和对现实的异化感,使得这一形象跳脱了传统的人物塑造层面,成为超越常态的存在。通过将主人公定位为“狂人”,两位作者不仅展现了人物的独特性,而且深刻探讨了人性、社会及其与个体之间复杂的关系。

在果戈里和鲁迅的同名作品中,由于主人公与众不同的精神状态而被定义为“狂人”,这一标签指向了他们精神层面的异常。福柯的观点深化了对精神疾病的理解,认为其不仅是医学或病理学的范畴,而且涉及文化和文明的领域。他强调,精神病不存在固有的本质,而是由一系列现象、符号和表征构成。非理性的存在与所有已知的理性存在形成对立,不仅凸显了非理性本身,而且反映了它作为特殊存在的意义。福柯认为,精神病患者是“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”,意味着他们的存在和身份只能在与“正常”状态的相对性中被理解和定义。换言之,果戈里与鲁迅塑造的“狂人”不仅是精神上与常人不同的个体,而且他们的形象超越了传统医学的范畴,成为探讨文明、文化及其与个体关系的重要载体。“狂人”的形象通过与理性世界的对比,不仅揭示了社会对非理性的态度和反应,而且展现了精神疾病在文化和文明背景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。因此,主人公的存

在不仅是对个人精神状态的描绘,而且是对整个社会文化现象的深刻反映和批判^[3]。

在果戈里和鲁迅笔下,狂人的形象不仅是小说的中心,而且构建了特殊的文化与文明网络。在这个网络中,“狂人”因与常人的对比而显得尤为突出,他们的身份是通过与所谓“正常人”的相对性来定义的。换言之,无论是作品中的其他角色、作者本人还是阅读者,都成了界定“狂人”与“正常人”界限的参照物。相对性使得两位作家得以利用“狂人”这一形象,从全新的视角出发,揭露并反思现实世界的诸多问题。

具体到狂人的表现,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典型特征。首先,他们的思维方式呈现出明显的跳跃性,缺乏逻辑上的连贯性。例如,鲁迅作品中的狂人能够从月光联想到赵家的狗,再由此想到妹妹的死亡,接着跳到完全不相关的“易子而食”故事上。相似的,果戈里作品中的波普里希钦也表现出类似的跳跃性思维,他的幻想从自己是“西班牙国王”转变到“中国和西班牙是同一个国家”,然后又想象“地球要坐到月亮上去”。其次,狂人经常会经历幻觉妄想,感知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事物。这种现象在医学上被称为“幻视、幻听、幻触”。鲁迅笔下的狂人对周遭人们抱有深深的怀疑,担心自己受到他们的伤害,甚至在平静的夜晚也能感受到房梁和椽子在其头顶上颤抖。在梦中,狂人还与一个青年就某些观点展开了辩论,最终让那青年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。果戈里笔下的波普里希钦对幻想的沉迷体现在他虚构的“狗的信”上,信件的内容完全出自他的幻想。狂人的形象不仅反映了他们与常态社会的割裂,而且展现了他们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。通过这样的叙述,两部作品不仅深化了人们对“狂人”这一形象的理解,而且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所谓的“正常性”,以及文化与文明中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。

展示与叙述狂人形象,在本质上是对其所处社会制度的质疑和反抗,揭示了制度的不合理之处。这种展示不仅在情感层面带有复杂的双重性,而且在心底深处呈现出极度的复杂性。狂人们激烈批判了他们生活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社会,批判既源自对社会的深爱,又因希望改变而展现出摧毁的决心。在一个充满迫害妄想和恐惧的环境中,狂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,迫使他们在内心深处寻求突破,以扭曲的方式爆发出来。精神的错乱和人格的分裂成为这种爆发的直接后果。两个狂人的“救救孩子”的呼声,实质上是对自救及社会救赎的渴望。“救救孩子”的呼唤在特定情境下显现出其深层含义,形成了静默中的对话系统。展示的意义在于,他们通过对周遭平凡环境的深刻洞察,将内心的觉醒和对社会的批判直接表达出来,通过狂人自身的言行释放出这一批判,以震撼和唤醒每一个身处其中的普通人。《论语》曾提到:“狂者进取,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这里的“狂”,既是对

世俗的不屑一顾,又是个体在遭遇外部侵害时的激烈反应,表现为对社会的深刻批判和个人理想的追求。所谓狂人,不仅是被外界定义的失去理智者,而且是在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的社会中保持清醒的真正觉醒者。“狂”的主题旨在通过极致的个性展示对社会的深度批判、寻求真理的同时,为言论自由提供可能的避难所。以“狂”为面纱的表达,不仅是对社会压迫的直接抗议,而且是对真实、自由追求的深刻展现。

果戈里和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在艺术形式上都采用了日记体这一独特的叙述方式,并通过第一人称的视角深入探索了狂人的心理世界。两部作品都细致描绘了主人公的多疑、敏感心态,并运用回忆、联想、幻话及幻觉等手法,生动地表现了狂人的心理活动和语言特点。形式上的相似,使得两部小说在探讨狂人心理和社会现实关系上具有共鸣。具体来说,日记体的运用为描绘狂人心理提供了理想的框架。果戈里的《狂人日记》包含十九则有日期记载的日记条目;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以十三则无日期的日记条目加一则前记的形式,展现了狂人的内心世界。结构上的选择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前所未见,与传统采用第三人称叙述、重情节连贯的叙事方式形成鲜明对比。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采取日记体,通过不连贯的心理描写和第一人称的直接表达,完美地捕捉了狂人变幻莫测的内心状态。

两部《狂人日记》不仅在文学上标志着日记体小说形式的重要创新,而且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开辟了新的道路。在鲁迅的带动下,日记体小说成为探索人物心理、反映现实生活的有效方式。作为特殊的小说体裁,日记体小说通过日记的形式切入,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呈现事件、情感和人物刻画,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,忠实地反映了人生的真实感受。在这一体裁下,日记的格式和艺术调性由作者自由掌握,日记的私密性质使得作品在思想上展现出极高的自由度。正是格式和思想上的自由度,加之对狂人特殊心态的深入挖掘,使得果戈里和鲁迅的作品不仅在文学上呈现出独特性,而且在心理和社会层面提供了深刻的洞见,展示了“狂人”这一特殊形象与社会现实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系。

日记体小说深刻地捕捉了心理的真实变化,展现了人物在遭遇困境时的即时心理活动。正如理查逊所指出的,这种文学形式能够生动地表达出处于悲伤和不确定中的痛苦与挣扎,相较于叙述自己已经战胜困难的叙述,日记体小说的风格更为生动和深入。特别是对于思维方式异常、精神状态复杂的“狂人”角色来说,他们奇特的逻辑

和受限的精神状态使得事后回忆变得困难且缺乏说服力。日记体的运用恰到好处地为狂人提供了及时“记录”他们那一刻的感受、混乱思绪及潜意识冲动的途径,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当时内心的苦楚。通过这种方式,日记体小说能够多角度、多层次地触动读者的情感,引导读者深入思考,重复品味,深入到情感体验的核心,激发读者的共鸣。这不仅让读者得以窥视人物的真实内心世界,而且展现了人物的真诚与作品的说服力。深层的心理剖析和情感共鸣,是日记体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显著特点,使得它成为探索和表达人物心理状态的理想选择。

在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中,“我”的形象及其狂言不仅自成体系,反而透过叙事的反讽,勾勒出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下反封建、求变革的知识分子形象。相反,果戈里的《狂人日记》里也存在着两个重要的“我”:波普里希钦这位狂人与名为美琪的狗。波普里希钦,一个地位卑微但内心充满对上司女儿爱慕的低级公务员,通过自称能解读狗语的特殊能力,窥视到上司女儿的狗美琪写给另一只狗的信,揭露了即便是在动物世界里他也被轻视。当得知上司女儿即将嫁给社会地位更高的人时,波普里希钦的内心世界崩溃了,他陷入了幻觉,幻想自己是遭遇流放的西班牙国王,最终在精神崩溃中哀求救赎。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形容果戈里的作品“以愚蠢开始,接着是愚蠢,最后以眼泪收场”,其独特之处在于那种被深深的悲哀所压倒的喜剧性。

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映射了中国现代社会的深层危机,通过“狂人”的视角无情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和社会的各种陋习,意在唤醒国民的集体意识。在鲁迅的笔下,叙述者的双重身份——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——构成了尖锐而深刻的张力;果戈里的叙述则通过幽默中透出的悲情,触动人心,唤起了对那个时代、那些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。对狂人形象的不同处理,不仅展现了两位作家对社会、文化及个体命运的不同洞察和表达,而且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方式和思想情感的差异。

参考文献:

[1] 韩婧怡,吴明龙,张雨晴. 中俄民俗对比——以鲁迅和果戈里作品为例[J]. 作家天地,2020(10):182-184.

[2] 李羽涵. 探求“怪人”和“狂人”在世俗尘埃下的明亮心灵——解读舒克申《怪人》和果戈里《狂人日记》[J]. 俄语学习,2016(6):60-62.

[3] 刘勇. 始终果戈里——鲁迅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琐谈[J]. 戏剧之家,2020(18):215.